

「商界－學校」協作： 裝備香港弱勢學生升學就業技能

何瑞珠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

姜培芝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香港中心

楊鎮偉、李文浩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青少年學生面對升學就業選擇時，往往尋求家人和朋友幫助。但對於缺乏文化及社會資本的基層家庭學生來說，其識見及可得到的資訊有限，他們參與校內或校外的升學就業活動更為重要。在這些活動中，透過「商界－學校」協作推出的活動，能為弱勢學生提供更實際的升學就業資訊及職場體驗。本研究於 2013 年收集了 3,800 多位曾參與香港一項「商界－學校」協作計劃的中學生的問卷數據，並以多元迴歸模型分析方法，探討弱勢學生參與升學就業活動與他們掌握升學就業技能的關係。結果顯示，若把學生的個人及家庭背景因素（性別、出生地、家庭結構及社經地位）納入分析，弱勢學生透過參與由商界機構提供的升學就業活動，對他們掌握升學及就業技能方面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關鍵詞：「商界－學校」協作；弱勢學生；升學就業技能；生涯發展

引言

青少年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在完成中學教育後，其升學和就業路向如何一向受政府和社會政策制訂者關注。從經濟發展角度而言，青少年是勞動市場極為重要的人力資源，而更重要的是，社會亦期望青少年在尋找出路時能建立正面的人生方向和價值，令社會得以穩步發展。從青少年個人成長角度出發，升學或就業抉擇

亦可視為他們從學校過渡至社會的轉捩點（Bynner, 2000; Heinz, 2003）。若青少年有能力深入考慮個人志向及發展條件，並作出統整（congruent）及適切的抉擇，便有利於他們實踐自我，以達至更高的生活滿足感（life satisfaction）。

因此，為青少年提供升學就業方面的資訊和輔導，協助他們尋找合適出路並規劃未來發展實不可或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4）的報告亦指出，提供完善而全面的職業輔導工作，例如有關升學就業的資訊、諮詢及工作培訓等，對青少年掌握升學就業路向具正面作用。然而，不同社會群體的青少年在接觸升學就業資訊及輔導上仍存有分別。有研究指出，由父母或人際關係網絡所獲得的資源和支援能有助青少年規劃日後出路（Kim & Schneider, 2005, Sandefur, Meier, & Campbell, 2006），但對缺乏文化及社會資本的基層家庭青少年而言，這意味着他們需要在以家庭為中心的關係網絡外才能獲取更多升學就業資訊或輔導。就香港本土情況來看，社會發展目前以知識型經濟為主導，對於未來人材的學歷、技能水平有更高要求，來自基層家庭的青少年因發展條件及資源稍遜，可能在升學就業機會上遭遇較多限制。針對此情況，香港政策制訂者開始積極解決在學青少年的出路問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4），向他們提供更多元化的升學就業資訊及輔導管道，包括講座、職場參觀及實習體驗等，使他們於在學時期及早策劃個人未來的升學就業路向，以在其理想職業的實踐道路上，早日得到相關知識及技能的啟蒙及培訓。因着近年政府政策推動及企業參與社會事務的意識上揚，動用商界資源及網絡啟動或提供的資訊、體驗及學習，成為了學校推動升學就業輔導工作的新動力。

基於上述觀察，我們關注社經條件處於弱勢的青少年是否具備足夠的升學就業技能，以在升學就業路向上作出良好選擇，特別是對於缺乏家庭文化及社會資本的弱勢學生，其父母背景和家庭資源未必能夠提供適切的指導和支援。本文嘗試探討他們在參與校內或校外的升學就業活動——特別是以「商界－學校」協作模式啟動的升學就業活動，對其掌握相關技能的影響。

文獻回顧

升學就業探索——青少年生涯發展的重要任務

要探討青少年的升學就業技能及行為，實質是要探討在青少年階段如何規劃及發展個人「生涯」（career），¹亦即各個連續發展的生命階段的不同任務和角色（Super, 1980）。有關個人生涯發展行為的研究，西方社會（尤以美國為中心）早於20世紀初已經起步，從早期 Frank Parsons 所倡議講求辨識個人在生涯發展的成功素質（Leung, 2008），至尋求更理想的「職業人格類型－工作環境」適配（Holland,

1985, 1997)，再逐步演變成較為近代各地學者及輔導工作者認同的發展性進路（developmental approach）。這進路提出一般人的個人生涯選擇並不會一夜之間形成，而是透過個體主動探索，在成長過程中由個人、環境因素或關鍵事件積累所促成，且會隨着人生的發展階段而不斷重塑。

Super（1969, 1980）針對「自我概念」而提出的生涯發展理論（self-concept theory of career development）被視為經典。Super 認為基於人在能力、個性及興趣等方面的差異，個體會按照個人獨特的素質及其對這些素質的理解，尋找並發展相符的生涯路向。隨着個體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社會環境及人與環境交互影響的變化（Savickas, 2002），Super 按照兒童至成年晚期不同階段的人生發展，提出序列性的事業發展階段，並歸納出各階段個體需要處理的發展任務，協助個體在生涯上邁向成熟（career maturity）。對應 14–24 歲青少年發展階段的主要是探索（exploration），而首要的發展任務是生涯方向的「結晶化」（crystallization）。當 14–18 歲青少年在身、心、智各方面對於自我及外在世界逐漸建立理解及探索能力，便開始能夠構想如何就個人興趣、技能及價值，初步建立生涯方向。這階段的重要性在於個體逐漸開始對個人生涯有較強的規劃動機，會透過不同行動對自己及工作世界進行更深入的探索，以便在稍後階段（19–24 歲）更有信心地按照個人素質排列可發展職業的優次，「特定化」（specifying）及「實踐」（implementing）個人的生涯選擇。

Gottfredson（1996, 2002, 2005）就生涯抱負所提出的理論則關注個體如何在生涯探索過程中「排除」（circumscription）一些職業並作出「妥協」（compromise）。Gottfredson 認為，個體「外在」（public）的自我概念（如性別、社會階層）較諸「內在」（private）的自我概念（如能力、興趣、價值觀）對生涯探索及發展更具先決性，原因是早於兒童階段，個體便按照「性別角色」（sex role）及「社會聲譽」（prestige）把那些與「外在」個人素質不相稱的角色排除在考慮之外。假設有位小孩面對一項未知的職業，他／她最直接想到的是：「職業 A 多數由男性擔任，不適合我和其他女孩子」、「從事職業 B 的人通常都很富有，與我相差太遠了」，並訂立可接受的職業選擇（acceptable occupational alternatives）範圍，Gottfredson 稱之為「排除」的過程。到青少年及後期階段（14 歲或以上），個體在職業選擇上開始注視及展現個人「內在」的素質，繼而從早前訂定的範圍內尋求最理想的選擇（most preferred alternatives）；然而，在經濟狀況、就業市場需求等現實環境因素與個人志向產生矛盾時，個體便會在理智上進行調整，逐漸將一個可接受的選擇看成不錯的選擇，亦即 Gottfredson 所稱的「妥協」過程。

以上的發展模型說明，青少年的生涯發展具有兩個主要特性：（1）Super（1980）清楚指明探索未來路向是青少年階段生涯發展的表徵，表示個體在選定及投入某一升學就業路向之前，仍有相當大的彈性探索，在過程中建構對個人、工作世界以及

兩者適配程度的理解；（2）Gottfredson（1996）提出青少年的生涯建構過程容易受到「外在」自我概念（如性別、社會階層）的限制，可能會過度或過早排除個人生涯的可能性。上述兩個特性表明，若要透過任何方法協助處於弱勢的個體更好地發展個人生涯，青少年階段是最為重要的時機。

影響青少年升學就業發展的因素

在探討個別方式是否有效協助青少年準備升學及就業前，或許先要梳理清楚影響青少年升學就業發展的因素。過往有不少理論研究從個人、環境及行為三個面向，描述個體升學就業抉擇的過程，並指出三者之間具有互相依存的性質與影響（Bandura, Barbaranelli, Caprara, & Pastorelli, 2001; Gottfredson, 2002, 2005; Lent, 2005; Lent, Brown, & Hackett, 2002）。就解釋青少年升學就業發展因素來看，當中個體與生俱來的特質（「個人」）、家庭社經條件和可得的資訊及支援（「環境」）都不盡相同，但個體仍能選擇如何取得學校或社區所提供的升學就業資訊及輔導（「行為」），以便更好地裝備自己作出相關抉擇。

個人層面方言，上文曾提及 Gottfredson（1996）的發展性模型以性別為影響生涯規劃（尤其是發展早期）的個人因素，而這種由性別所產生的影響是由社會認知因素多於生物因素所致。Farmer（1985, 1997）總結其一項追蹤研究，在 Bandura（1977）社會學習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性別角色社會化過程很大程度影響個體實現個人生涯成就的動機（motivation of career achievement），諸如所要達至的教育程度、職業選擇、婚姻及家庭狀況等，均會隨着個體與環境的互動而調節。早在兒童時期，個體便在學校或大眾媒體中透過觀察及模仿，逐步建立兩性在家庭及社會所扮演的角色（Bem, 1981），並按照個人性別，判斷及選擇社會認為相符的行為。然而，這些資訊往往強化了兩性在家庭及職業上的分工，並逐漸造成認知上的分隔。

以香港為例，平等機會委員會（1999, 2000）曾分析香港學校教材的內容，並以質化研究方法採集學生意見，發現大部分教材描述社會上不同的專業及工作時，仍然採用傳統性別定型，女生較常配以藝術、教育、護理等工作，而總體來說女性形象較少出現在有關「工作」的論述當中；男生則較常視作適合從事有關科學、資訊科技、工程、體育及技術的職業；兩性學生對學科、職業的取向以至家庭的角色，亦明顯受到性別定型所規範。社會預期女性在照顧家庭及養育兒女方面作出更大承擔（commitment）（Gilbert, 1994），這種「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令女性在個人生涯發展上面對較大掙扎和較少選擇。研究亦指出這些在工作及家庭角色之間的矛盾（role conflict）成為了女性職業發展的阻礙（Day & Chamberlain, 2005; Perrone, Webb, & Blalock, 2005），而單是對未來角色矛盾的觀感亦對成長中女性的生涯規劃帶來影響（Friedman & Weissbrod, 2005）。

環境層面方言，家庭是個人成長最重要的環境，而家庭背景如父母的教育程度、職業和社經地位，與子女的教育和職業成就（*attainments*）關係密切。以資本角度看，父母擁有不同種類的資本對子女獲取教育機會具有重要影響（藍郁平、何瑞珠，2013）。財務資本（*financial capital*）是指透過家庭收入和財富的累積，構成在課業學習上重要的教育資源。研究指出具較高社經地位的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投入相比基層家庭父母的為多，因而間接導致學生所得教育機會出現差異（Lareau, 2000）。此外，家庭背景亦涉及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及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Bourdieu（1986）以文化資本的概念探討家庭背景對子女學業成績的影響，指出來自較高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其家庭成長背景早已令他們熟悉學校生活和要求，因而有利於取得較佳學業成績。Lareau（1987）及 Lareau & Horvat（1999）的研究亦以文化資本的分析視角，指出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擁有較多文化資本，相比基層家庭較容易獲得較佳教育機會。而美國社會學家 Coleman（1990）提出社會資本，強調利用由人際關係的互動及網絡所能動用的資源可以影響學生取得的教育機會和成就。社會資本可區分為家庭內及家庭外（藍郁平、何瑞珠，2013；Coleman, 1988）兩類：家庭內的社會資本主要表現於父母與子女的互動關係上，這包括傾談、參與子女的學業指導或學校所舉辦的家長活動等；而家庭外的社會資本則指學生接觸所及的人際網絡，例如學校裏的朋輩、老師，甚或是鄰居及其他社區關係的群體。

有關家庭背景與了解升學就業選擇的研究結果顯示「代間傳遞」（*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的現象指出：具有較高社會階層的父母較期望子女取得較高教育程度，而傾向為子女選擇升學路向。Payne（2001）指出父母的教育程度和職業是構成子女升學就業選擇的決定因素，這反映於具有較高教育程度或從事專業工作的父母，因具備接受高等教育的經驗並熟悉就業情況及資訊，對子女的教育抱負和職業路向有較高期望。相反，來自基層的父母因缺乏文化及社會資本，在協助子女面對升學就業選擇時出現困難和限制，從而影響了子女日後所取得的地位（*status attainment*）。儘管文化再製理論（*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強調教育機會或職業成就的差異來自父母的教育背景及職業地位，但這亦不能忽略透過參與家庭外文化活動而取得的資本。當中，DiMaggio（1982）提出的「文化流動模式」（*cultural mobility model*）主張把學生參與的各項活動類型納入分析，發現當控制了家庭背景和學術能力之後，學生參與不同層次的文化活動除對成績具顯著影響外，他們從中亦能取得接觸文化資本的機會。換言之，這意味基層家庭學生能從活動參與中，改善在結構上部分文化資本的缺失。

家庭內的文化及社會資本固然能協助青少年獲取升學就業資訊並形塑他們的教育和職業期望。同時，青少年還可透過與父母、師長或朋輩傾談和分享，從他人經驗和觀點中了解各種多元化升學就業出路，以助自己適切評估和探索未來路向。威斯康辛

派模型 (Wisconsin model) (Sewell, Haller, & Portes, 1969) 指出影響個人日後取得地位的因素，除了父母家庭社經地位、教育程度和職業之外，還強調「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 的期望與同儕的影響。同樣，Coleman (1988, 1990) 指出父母對子女的關注與鼓勵，對子女個人目標的追求及實現具有重要作用，這亦是促成家庭內社會資本營造的關鍵元素。尤其在教育期望的傳遞上，若父母與子女多從日常傾談中表達彼此在教育期望上的想法，有效溝通便能有助提高教育成就。過往文獻亦指出，這類「重要他人」的影響，特別是在青少年踏入認知發展初期，對青少年探索將來從事的職業有明顯關係 (Jodl, Michael, Malanchuk, Eccles, & Sameroff, 2001)。然而，當青少年升讀更高年級而開始面對升學就業抉擇和思索未來事業時，一些具體行業的資訊和體驗更能有助他們認識該行業職責、前景待遇和事業發展。透過與行業人士傾談，這類經驗分享能使青少年獲得基礎的行業知識及指導，可為他們訂立更明確的職業指引，對未來事業作好準備。

行為層面而言，自 20 世紀 70 年代起，香港政府在中學常設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一職，為學生提供綜合的升學就業輔導服務，旨在透過校內課程及相關活動，促進學生規劃前路 (Leung, 2002)。然而，礙於中學面對公開考試的課程進度已相當緊迫，加上教師工作繁重，有評論指相關教育活動及學生支援服務尚待更全面及深入的發展 (Ho, 2008; Leung, 1999, 2002)。根據 Leung (1999) 的研究，形式上大部分學校相當依賴就業講座及職場參觀等大規模活動，相關內容卻較少整合到原已非常緊密的正規課程當中，而且偏重分享升學資訊 (如報讀學位或課程的要求及方法)，少就學生個人興趣及就業取向進行探索；該研究指出這關乎學校缺乏對事業規劃的發展視野及對執事教師的培訓。

2012 年教育局配合香港新高中課程推行「應用學習」(Applied Learning) 這個選修科目，高中學生可按興趣於「創意學習」、「媒體及傳意」、「商業、管理及法律」、「服務」、「應用科學」及「工程及生產」六個範疇選擇，進行着重實務的學習，強調「透過應用學習課程中與職業相關的情境，加深對各行各業的認識。藉着了解專業領域內的知識、技能和職場要求，學生得以訂立就業的方向」(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9，頁 2)。可惜，該科自推行以來報讀人數按年下滑 (〈研究：修應用學習缺升學渠道〉，2014；〈應用學習報讀人次跌穿一萬〉，2013)，反映課程於學校及社會仍未得到足夠認受性。及至香港政府於《二零一四年施政報告》提出加強青少年生涯規劃的支援，旨在「以更全面支援學校提供升學及就業輔導服務，以及拓展生涯規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4，頁 23，段 105)。於學校層面，政府由 2014–2015 學年起向開辦高中級別的公營學校分配相等於一名學位教師職級薪金的額外經常津貼；同時，在社區層面「推動更多工商機構和社區資源參與『商校合作計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4，頁 23，段 105)，這

意味香港工商機構和社區資源在學校升學就業輔導工作的參與愈顯重要。由此可預視生涯規劃及升學就業教育將成為香港學校教育發展議程上不可或缺的一環，除現時校內常設的升學就業輔導工作外，校外（特別是運用工商界資源及網絡起動的）活動項目將有相當可觀的發展。

就「商界－學校」協作推動學校改進的方式在西方國家的發展相當具參考意義。澳洲教育、就業和勞動關係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2010）整理當地及海外主要「商界－學校」合作計劃，指出近 20 年「商界－學校」協作模式在提升學生就業技能和生涯發展意識上，主要是透過學徒招募、工場學習等方式給予學生培訓機會；或在財政及企業網絡上支持學校，即如美國相當普遍的「領養學校」（“Adopt-a-School”）計劃，概念上是當地企業與學校配對成為「資助者－受惠者」組合，令學校在發展上得到更充裕資源及機遇。反觀香港，即使「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意識開始普及，上述的協作模式仍未見具系統的發展。較常見的是由各院校與企業協辦職場體驗課程和實習機會，使學生了解不同生產行業及勞工市場對僱員的要求，但對象多限於就讀職業訓練局或進入大學部分專業的學生，但在中學層面這類學習活動可謂非常缺乏。

直至 2011 年，「學校起動計劃」（下稱「起動計劃」）在香港一個橫跨多個業務範疇的商業集團（下稱「集團」）帶動下，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合作而展開，成為本土創新的大型「商界－學校」協作行動（黃顯華、韓孝述、李文浩，2012）。「集團」所提供的資金及在企業間所發揮的協同效應，使主要錄取第三組別²學生的成員中學獲得不同資源，以規劃各色各樣有助學生全人發展的項目。「集團」發揮商界優勢，調動屬下橫跨地產行業、零售百貨、物流運輸、電訊及廣播等不同行業的業務單位（business units），在大學的協助下推動一系列有利學生生涯規劃的活動。這些活動的最大特色，是按照學業成績及社經地位較低學生的需要而設計，幫助學生從現實職場及社會體驗中拓展對未來職業及個人發展的路向，並在態度及技巧上做好裝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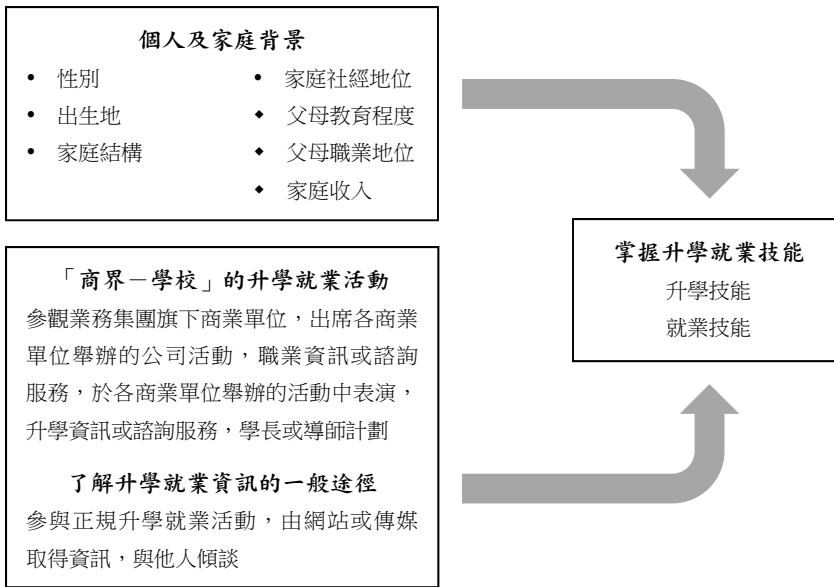
小 結

上述文獻回顧展示了青少年的生涯發展過程如何受到個人、環境、行為三個層面因素的影響，但現有研究對華人社會弱勢學生的着墨明顯較少。因此，探討香港本土弱勢學生在學期間如何透過各類型升學就業管道，了解及規劃其升學就業路徑更為重要。在香港政府近年的政策推動下，運用商界及社區資源為學生提供的升學就業輔導活動逐漸增加，這類學習經歷相信能使參與者開拓視野及取得實用的升學就業資訊。現時這類學習經歷尚在起步階段，有必要探討它們對弱勢學生升學就業發展所發揮的作用，從而更有效地運用這些機會，裝備學生預備未來的升學就業路向。

研究架構及問題

本研究以自編問卷進行量化分析，調查受訪學生的個人及家庭背景，以及其升學就業學習活動和經歷，再將所得數據資料以多元迴歸模型分析方法，探討受訪學生在了解升學就業途徑、參與種種升學就業活動的現況，以及其個人及家庭背景等變項對他們掌握升學就業技能的影響。本研究架構如圖一所示。

圖一：研究架構



根據以上架構，本研究設定以下兩個主要研究問題：

1. 學生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和參與「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的現況如何？
2. 在控制學生的個人及家庭背景因素後，學生參與「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和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是否影響他們掌握升學就業技能？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參與「起動計劃」的香港十所中學就讀中三至中六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樣本總人數為 4,216 人，這十所學校全屬第三組別學校。本研究的問卷回應人數為 3,846 人，受訪學生當中男、女生分別佔 57.4% 及 42.6%，就讀中三（29.4%）、中四

(23.4%)、中五(24.4%)及中六(22.8%)。內地出生和非內地出生的學生比例分別佔 37.7% 及 62.3%。根據香港統計處公布的 2011 年人口普查數字，顯示 77.8% 的香港適齡全職學生³ 於香港出世(政府統計處，2012)，可發現本研究的對象於內地出生的比例比全港整體學生群體較高。在家庭結構方面，大部分受訪學生主要是與父母同住(71.1%)，但亦有 28.9% 學生來自單親或無父母家庭。至於受訪學生的社經背景方面，學生父母的教育程度主要為中三(28.9%)、其次為中五(16.5%)、小學或以下(15.0%)；而學生父母現時或最近期從事的職業較多屬基層職業(27.3%)，例如清潔工人、雜工、搬運工人、保安員等，其次為服務員及售貨員(22.4%)、技術員及有關行業工人(14.4%)。至於家庭每月總收入主要介乎 \$10,000–14,999 (27.7%)、\$15,000–19,999 (18.0%)、\$5,000–9,999 (15.3%)。根據由香港扶貧委員會對貧窮線的定義及 2012 年的數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3)，有 15.2% 的香港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若利用家庭每月總收入的變項計算，本研究的受訪學生家庭大約有 36.0% 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由此可見，受訪學生的社經地位相對較低，反映出其家庭經濟條件及文化資源比一般香港學生顯得較為薄弱。

數據收集過程

問卷於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 月期間以紙本發出，由學校安排學生於約 40 分鐘內完成。學生在教師或教學助理促導下完成問卷；少部分學生因缺席或遲到無法於當日完成問卷，在稍後時間亦有補填問卷。本研究共收回有效問卷 3,846 份，回收率達 91.2%。

研究工具

因應研究對象均就讀於中文中學，研究小組以中文編寫問卷。問卷編製流程如下：經由研究小組會議討論研究焦點和題目，繼而邀請相關計劃成員對問卷初稿進行預試，刪除內容不清或不具鑑別度的問題，然後再以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測量各題目的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並利用陡坡圖決定因素數目並進行因素的轉軸分析。從因素分析矩陣中，依據各題目在某一特定因素的負荷量大小來判斷題目歸屬的層面。本研究的變項包含四大類別，以下將分別說明其操作定義和內涵。

個人及家庭背景

1. 受訪學生個人資料，包括性別、出生地、家庭結構、所屬學校及就讀年級。本研究以虛擬變項方式，將女生、內地出生、單親或無父母家庭設定為 1。

2. 受訪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利用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萃取父母最高教育程度、父母最高職業地位及家庭收入變項的得分，成為一個標準化指數，用作反映受訪學生所屬家庭社經地位的指標：

- 父母最高教育程度——指親生父母或監護人的最高學歷，由學生分別回答父親或男性監護人和母親或女性監護人的最高完成教育程度，共劃分為學士或以上、大專（非學位）、文憑／證書課程、中七畢業、中六畢業、中五畢業、職業訓練課程、中三畢業、小學畢業或以下。本研究將「不適用」的選項排除在外，不列入分析。在建構「家庭社經地位」時，只納入父母兩者中較高的教育程度，並轉換成教育年數計算。
- 父母最高職業地位——依據曾榮光（2004）所編製的職業分類列表及 2009 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問卷中父母職業選題作參考，將職業類別分為九個等級，分別為基層職業、機械設備操作員及裝配工、技術員及有關行業工人、漁農業及林業技工、服務員及售貨員、文員支援人員、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專業人員、行政管理人員。至於照顧家庭、退休或不適用等選項，本研究將之排除在外，不列入分析。由學生自行填寫其父親及母親現時或最近從事的職業；同樣，將父母兩者中較高的職業地位納入「家庭社經地位」變項。
- 家庭每月總收入——本變項依每月收入多寡分為九個等級，幅度由\$5,000 以下至 \$40,000 或以上。

升學就業經歷和活動

本研究在升學就業經歷和活動的概況上區分出以下兩大類別作探討：

1. 「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總結六項由「起動計劃」籌辦及提供予學生的活動，分別為「參觀業務集團旗下商業單位」、「出席各商業單位舉辦的公司活動」、「職業資訊或諮詢服務」、「於各商業單位舉辦的活動中表演」、「升學資訊或諮詢服務」及「學長或導師計劃」。這問題需要受訪學生回顧由 2011 年 9 月至填答當日參與每項活動的次數。每題設有四個選項，分別是「零次」、「一次」、「兩次」、「三次或以上」。為方便分析，研究小組利用主成分分析萃取一個變數，以反映受訪者參與上述活動的情況。
2. 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根據香港 PISA 2012 年追蹤青少年升學就業成長的「香港青少年追蹤研究」（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HKLSA），搜集香港中學生在學校內、外能夠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途徑，受訪學生需要回答有否循 11 項途徑了解升學就業路向的情況。本文利用因素

分析偵測「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的結構，取樣適切性平均量數（KMO）為 .88，可見資料進行因素分析的適切性良好；球型檢定（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的 p 值小於 .001，檢定結果顯示變項間有顯著相關性，說明資料值得進行因素分析。表一顯示轉軸後的因素分數矩陣得出三個主因素，按題項的意義歸納出以下類別：「參與正規升學就業活動」、「由網站或傳媒取得資訊」及「與他人傾談」。從因子分析結果顯示，三個因子負荷的範圍由 .66 至 .84，表示抽取因子的構念相當穩定。三個因素合共解釋了受訪學生在「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的 59% 變異數（variance explained）。

表一：「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各題項在因素分析中的因素負荷

	參與正規升學 就業活動	由網站或傳媒 取得資訊	與他人傾談
參加生涯規劃營	.75		
參加「應用學習課程」導引課程	.74		
參加大專院校的開放日／導覽行程	.66		
參加大學課程體驗班／體驗營	.84		
參加招聘會	.81		
使用「青年就業起點」等政府服務或設施	.78		
大眾傳媒（如：報紙／電視／電台）		.81	
搜尋互聯網		.83	
與家人或親戚傾談			.71
與朋友或同學傾談			.80
與學校老師個別或分組傾談			.66

升學及就業技能

根據香港 PISA 2012 計劃中的「學業前途與資訊科技」問卷，抽取有關學生升學及就業技能的選題再加以修改。此變項旨在了解受訪學生能否掌握相關的升學或就業技能以協助其達至更佳的升學就業選擇。本研究沿用中文版本的七項選題（包括三項升學技能和四項就業技能），並以三點量表方式作答（「毫不掌握」得 1 分、「略為掌握」得 2 分、「十分掌握」得 3 分）。為方便分析，研究小組利用主成分分析萃取一個變數，以反映受訪學生對上述技能的整體得分。

信度分析

在信度方面，利用信度指數（Cronbach's alpha）檢測各因素及變項，以保證測量結果具有一致性及穩定性。各因素及變項的信度分析結果為：「商界—學校」升學

就業活動 (.725)、參與正規升學就業活動 (.858)、由網站或傳媒取得資訊 (.501)、與他人傾談 (.561)、掌握升學技能 (.772) 及掌握就業技能 (.788)。上述指數均顯示各變項具有滿意的信度，故本問卷的信度在可接受的範圍。

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 SPSS for Windows 中文 21.0 版進行資料處理及分析。在正式收回問卷後，本研究進行以下分析：首先利用敘述統計，描述受訪者背景因素及各研究變項的分布特性；然後就不同升學就業活動進行相關分析；最後則利用多元迴歸模型分析方法，探討受訪學生的個人及家庭背景、參與「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各層面對掌握升學就業技能的影響。

研究結果及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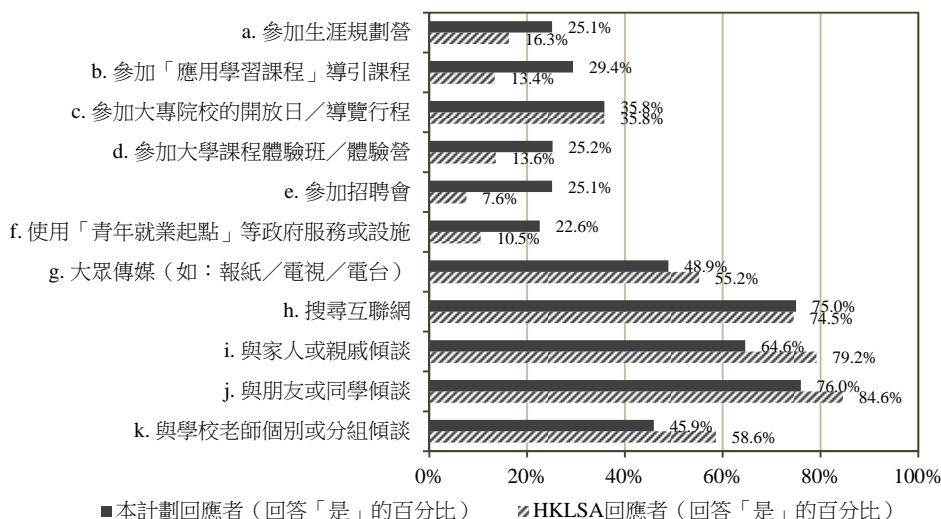
描述分析

本節會就受訪學生在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參與「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掌握升學就業技能的情況作出描述分析；首兩項情況並與現時本港一項青少年追蹤研究⁴數據中低組別學校的情況相比，以探討與本研究對象受訪學生群體的異同。

受訪學生在「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的情況

本研究受訪學生在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渠道主要是透過「與朋友或同學傾談」(76.0%)、「搜尋互聯網」(75.0%)、「與家人或親戚傾談」(64.6%) (見圖二)。與 HKLSA 受訪學生相比，本研究的受訪學生較少由「與他人傾談」的渠道獲得升學就業資訊，尤其在「與家人或親戚傾談」和「與學校老師個別或分組傾談」上，分別比 HKLSA 受訪學生相對少 14.6% 和 12.7%。而「由網站或傳媒取得資訊」上，本研究的受訪學生經由「搜尋互聯網」渠道的略高於 HKLSA 受訪學生，但在「大眾傳媒」獲得資訊的渠道較 HKLSA 受訪學生為少。另一方面，本研究的受訪學生經由「參與正規升學就業活動」的百分比各不多於四成，但與 HKLSA 受訪學生相比，則較重視「參與正規升學就業活動」所得經驗以了解更多升學就業資訊，其中只有「參加大專院校的開放日／導覽行程」與 HKLSA 受訪學生相若。在「參與正規升學就業活動」當中，受訪學生參與職業相關的活動項目以「參加招聘會」和「參加『應用學習課程』導引課程」分別比 HKLSA 受訪學生多出 17.5% 及 16%。結果反映

圖二：受訪學生在「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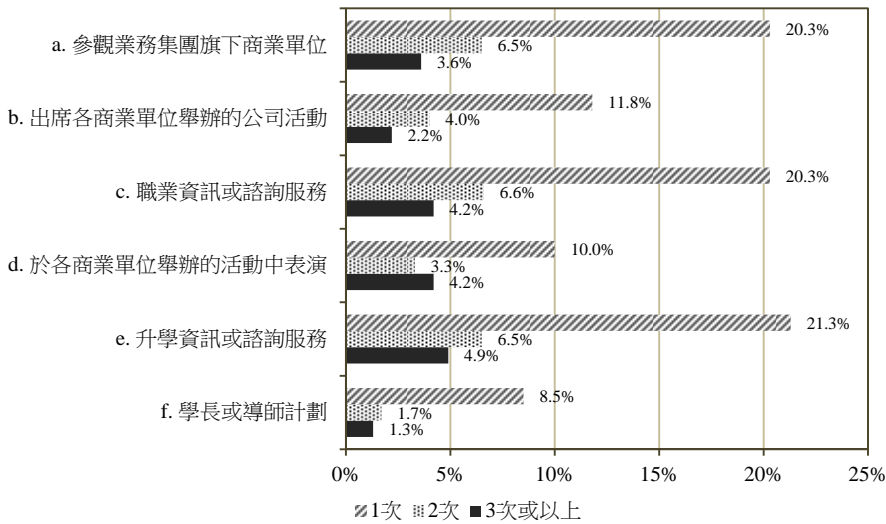
註：百分比以刪除遺漏值計算

受訪學生相對一般香港學生較少與身邊的人傾談有關升學就業事宜。相反，他們較一般香港學生更多依靠「參與正規升學就業活動」所得經驗以了解自己的升學就業路向；而本研究的學生參與職業相關的活動項目相對較多，亦反映出他們較傾向關注以選取職業為未來路向。

受訪學生參與「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的情況

針對由「起動計劃」所籌辦及提供的活動而言，學生主要參與「升學資訊或諮詢服務」（32.7%）、「職業資訊或諮詢服務」（31.1%），以及「參觀業務集團旗下商業單位」（30.4%）等活動（見圖三）。若以參與次數來看⁵（三次或以上），受訪學生傾向多參與有關「升學資訊或諮詢服務」（4.9%），其次為「職業資訊或諮詢服務」（4.2%）及「於各商業單位舉辦的活動中表演」（4.2%）。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由「起動計劃」所提供的升學或職業諮詢服務有別於一般校內提供的輔導資訊，其特點在於針對弱勢學生的生涯發展取向及需要而設計，例如分享環節會邀請與學生成長背景相似的現職員工，以其經驗分享如何面對求職申請、規劃個人事業發展、評估工作市場要求等，期望這些「榜樣」（role model）的經驗之談對參與學生起示範或啟發作用。至於「參觀業務集團旗下商業單位」更是運用「集團」的資源和在商界的網絡優勢，針對不同行業的職業環境實況而設計的學習活動，參與學生會獲派

圖三：受訪學生參與「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的情況



註：百分比以刪除遺漏值計算

到「集團」屬下不同業務單位進行觀摩學習，所涵蓋的行業包括物流、廣播、酒店、零售及物業管理等。此活動令學生認識該行業的運作狀況及發展前景，從而擴闊學生對不同行業的眼界，有助他們及早規劃個人未來的生涯發展。

受訪學生掌握升學和就業技能的情況

表二顯示在升學技能方面，受訪學生自覺最能掌握「如何尋找專上教育課程的資料」（平均值：1.77），其次為「如何準備入學面試」（平均值：1.70）。在就業技能方面，受訪學生自覺最能掌握「如何尋找職業資訊」（平均值：1.90），但最未能掌握的是「如何準備求職面試」（平均值：1.67）。在百分比的數據上，受訪學生表示「略為」或「十分」掌握「如何尋找職業資訊」（82.4%）、「如何尋找工作」（72.8%）和「如何撰寫履歷表或個人資歷摘要」（69.0%）。這反映受訪學生自覺對如何裝備相關職業較有信心。而有 9.4% 受訪學生表示十分掌握「如何撰寫履歷表或個人資歷摘要」，其次有 9.2% 表示十分掌握「如何尋找專上教育課程的資料」。但值得注意的是，有 42.1% 受訪學生表示毫不掌握「如何尋找學生資助的資料」，其次是「如何準備求職面試」（39.9%）和「如何準備入學面試」（36.5%）。這意味受訪學生在考慮升讀大學或專上學院課程時，自覺未能較清楚認識有關資助途徑（如學生貸款或助學金），這可能會影響其升學就業路向的抉擇。

表二：受訪學生掌握升學和就業技能的情況

	平均值*	標準差	百分比 [#]		
			毫不掌握	略為掌握	十分掌握
升學技能					
1. 如何準備入學面試	1.70	.59	36.5%	56.6%	6.9%
2. 如何尋找專上教育課程的資料	1.77	.60	32.3%	58.5%	9.2%
3. 如何尋找學生資助的資料（如學生貸款或助學金）	1.64	.60	42.1%	51.4%	6.5%
就業技能					
1. 如何尋找職業資訊	1.90	.49	17.6%	74.7%	7.7%
2. 如何尋找工作	1.81	.56	27.2%	64.7%	8.1%
3. 如何撰寫履歷表或個人資歷摘要	1.78	.60	31.0%	59.6%	9.4%
4. 如何準備求職面試	1.67	.60	39.9%	53.0%	7.1%

* 本問卷將學生的回應以 1 = 「毫不掌握」、2 = 「略為掌握」、3 = 「十分掌握」轉化為數值。

[#] 百分比以刪除遺漏值計算。

各項因素對掌握升學及就業技能的影響

最後，研究採用了多元迴歸模型分析方法以個人及家庭背景、「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為自變項，分別探討變項對掌握升學及就業技能的影響。簡單來說，模式 1 先將個人及家庭背景變項納入分析，然後逐步於模式 2 加入「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及模式 3 加入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變項，以觀察及比較各自變項解釋技能的變化。

掌握升學技能方面

表三顯示對掌握升學技能的影響的多元迴歸分析。模式 1 以個人及家庭背景四個變項與掌握升學技能的關係來說，發現社經地位變項對掌握升學技能具顯著影響，其迴歸系數 (.09) 呈現正相關，表示學生來自較高社經地位家庭對其掌握升學技能愈好。在個人及家庭背景中，內地出生、單親或無父母家庭、女生這三個變項與掌握升學技能呈現負相關，但統計上不顯著。當模式 2 加入「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變項後，其迴歸系數比個人及家庭背景變項的迴歸系數大，顯示學生在參與「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時每上升一個單位，其掌握升學技能則上升 .25 個標準差，似乎「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對學生掌握升學技能具有很重要的影響。而個人及家庭背景中，社經地位的顯著性維持不變，惟該變項的迴歸系數在掌握升學技能的相關上稍微減少，另外女生則呈顯著的負值 (-0.08)，表示女生在掌握升學技能上較差。最後模式 3 加入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變項後，個人及家庭背景的變項中，

表三：掌握升學技能的影響的多元迴歸分析

	模式 1 個人及家庭背景		模式 2 「商界－學校」 升學就業活動		模式 3 了解升學就業資訊 的一般途徑	
	系數	標準誤	系數	標準誤	系數	標準誤
截距	.08*	.03	.09**	.03	.09**	.03
個人及家庭背景						
社經地位	.09***	.02	.07***	.02	.06**	.02
女生	-.05	.04	-.08*	.04	-.08*	.04
內地出生	-.04	.04	-.06	.04	-.05	.04
單親或無父母家庭	-.06	.04	-.07	.04	-.08	.04
「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						
			.25***	.02	.20***	.02
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						
參與正規升學就業活動					.17***	.02
由網站或傳媒取得資訊					.07***	.02
與他人傾談					.08***	.02

* $p < .05$; ** $p < .01$; *** $p < .001$

註：遺漏值以成列 (listwise) 刪除處理，有效樣本為 2,616。

社經地位變項的顯著性維持不變而迴歸系數則有些微下降。就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的三個變項而言，其迴歸系數全部均呈顯著的正相關，分別為「參與正規升學就業活動」(.17)、「由網站或傳媒取得資訊」(.07)、「與他人傾談」(.08)。雖然「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的解釋力稍減至.20，但這結果顯示「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比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對掌握升學技能的影響更見果效。決定系數 (R-squared) 在模式 1、模式 2、模式 3 分別為 .01、.08、.13，顯示每當加入新變項，迴歸模型的變異數解釋量均有增加。

掌握就業技能方面

表四顯示對掌握就業技能的影響的多元迴歸分析。模式 1 以個人及家庭背景四個變項與掌握就業技能的關係來說，發現社經地位、女生、內地出生這三個變項對掌握就業技能具顯著影響，當中女生(-.14)和內地出生(-.09)的迴歸系數均呈負值。當模式 2 加入「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後，同樣地「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的迴歸系數(.21)均比個人及家庭背景中各變項的迴歸系數大，這表示學生參與「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能提升其就業技能。最後模式 3 加入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變項後，個人及家庭背景變項中，單親或無父母家庭的迴歸系數(-.09)由不顯著轉化成對掌握就業技能具顯著性，社經地位的迴歸系數則有些微減少。就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的三個變項而言，其迴歸系數均呈顯著的正相關，分別

表四：掌握就業技能的影響的多元迴歸分析

	模式 1 個人及家庭背景		模式 2 「商界－學校」 升學就業活動		模式 3 了解升學就業資訊 的一般途徑	
	系數	標準誤	系數	標準誤	系數	標準誤
截距	.13***	.03	.14***	.03	.14***	.03
個人及家庭背景						
社經地位	.08***	.02	.07***	.02	.06**	.02
女生	-.14***	.04	-.16***	.04	-.17***	.04
內地出生	-.09*	.04	-.10**	.04	-.10**	.04
單親或無父母家庭	-.07	.04	-.08	.04	-.09*	.04
「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						
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			.21***	.02	.17***	.02
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						
參與正規升學就業活動					.13***	.02
由網站或傳媒取得資訊					.06**	.02
與他人傾談					.10***	.02

* $p < .05$; ** $p < .01$; *** $p < .001$

註：遺漏值以成列 (listwise) 刪除處理，有效樣本為 2,631。

為「參與正規升學就業活動」(.13)、「由網站或傳媒取得資訊」(.06)、「與他人傾談」(.10)。雖然「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的解釋力稍減至 .17，但相比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的迴歸系數為高，反映「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對掌握就業技能具有很大的正面影響。決定系數 (R-squared) 在模式 1、模式 2、模式 3 分別為 .02、.07、.11，顯示每當加入新變項，迴歸模型的變異數解釋量均有增加。

透過比較以上迴歸模型分析中各自變項對影響學生掌握升學就業技能的方向及程度來看，本研究大致能夠確定個人、環境及行為層面因素對弱勢學生升學就業技能的影響。與文獻回顧所述的研究結果及理論相仿，不同層面對於弱勢學生生涯發展行為的阻礙因素在本研究結果中同樣得到佐證；研究同時發現參與「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有助彌補這些因素的負面效果，程度較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為高。

本研究認為性別對弱勢學生掌握升學就業技能的影響力是值得探討的。上述迴歸分析中「女生」在升學及就業技能的負面影響達顯著水平，背後原因相當多元，其一可能如各社會認知學派觀點所提出，社會透過學校、家庭或大眾媒體的社會化過程對女性的性別角色產生了期望投射，令女性早在青少年期間已對個人未來在社會及家庭角色的認知上進行了限制，令她們在升學及就業發展的選擇上有所局限 (Gottfredson, 2002, 2005; Farmer, 1985, 1997; Friedman & Weissbrod, 2005)。但有趣的是，按照香港政府及機構近年所公布有關青少年升學及就業狀況的數字，香港女性的升學優勢

不斷提升。例如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數字，1996–1997 學年入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課程的學士學位中，男、女比例相若（50.4%：49.6%），但自 2001–2002 學年至 2013–2014 學年，女性學生持續較男性學生多出 5–8%（政府統計處，2014，頁 68）。這或可解釋「女生」對學生掌握升學技能的影響雖然是顯著地負面，但程度（-.08）卻不如對就業技能（-.17）的大。而事實上，隨着更多女性參與經濟活動，兩性差距已見收窄，例如單就香港 20–24 歲青少年人口而言，2012 年兩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同為 60%（婦女事務委員會，2013）。在此前提下，研究結果點出的應是女性弱勢學生在個人生涯發展認知層面的需要，值得不同持分者透過各種途徑向她們給予更大賦權。

結論及建議

本研究從生涯發展的發展性理論出發，嘗試探討「商界－學校」協作所推動的升學就業活動對香港弱勢學生掌握升學就業技能的影響。雖然「商界－學校」協作並非新鮮概念，但在華人社會內以弱勢學生為對象研究「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的成效，在現存文獻尚付闕如。有見及此，本研究以約 3,800 位香港弱勢學生為樣本，以迴歸模型分析探討「商界－學校」的升學就業活動相對個人及環境因素如何影響學生對升學、就業技巧的掌握。綜合分析結果發現，在學生的個人及環境因素（如性別、出生地及社經地位等）納入分析後，「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的迴歸系數數值最大而顯著，比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的三個變項都高。這反映無論是個人及社經背景不同的學生，在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各種因素上，「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對弱勢學生掌握升學就業技能的影響最為重要。這結果指出弱勢學生透過參與由商界機構提供的升學就業活動，對其掌握升學就業技能發揮顯著而正面的影響。最後，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以作日後策劃升學就業活動上的改進及未來相關研究的參考。

重視弱勢學生對升學就業狀況的了解

本研究嘗試探討父母職業、父母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等家庭因素與了解升學就業狀況的關係。研究顯示，受訪學生於內地出生和來自單親家庭的條件，令弱勢學生自覺其升學就業技能處於更弱勢。結果反映了缺乏家庭文化及社會資本的弱勢學生，其父母背景和家庭資源未必能為他們提供適切指導和支援，以致他們在掌握升學就業技能上較差。研究結果亦分析了弱勢學生在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和「商界－學校」活動的參與情況，以便能對弱勢學生的升學就業歷程現況作初步了解。期望

這些數據可給予教育當局及政策制定者參考，尤其對學校老師及家長為學生提供升學就業指導時，更需關注這群體獲取校外及商界支援的需要。

加強「商界－學校」協作——增加校外體驗或實習機會

本研究的「商界－學校」計劃自 2011 年開展，至今只有短短三年，本實證研究首次顯示這類協作活動對學生的升學就業歷程和技能具正面價值。從以上的分析結果可見，以「商界－學校」類別的活動項目對弱勢學生掌握升學就業技能明顯發揮重要影響力，說明了弱勢學生可透過參與職業相關的活動，加強他們在升學就業路向上的規劃和準備。透過這些交流及體驗活動，學生能進一步確立對職業的興趣、認識工作範疇和具備的資歷條件等，這有利於他們對職業所需的技能作好準備，從而協助他們在升學就業選擇階段作出適切的過渡。然而，「起動計劃」尚在摸索階段，在活動設計和安排上仍受多方面限制，在填答問卷的學生當中仍有 39.5% 學生從未參與過「商界－學校」升學就業活動（以級別分布為：中三 54%、中四 51%、中五 34%、中六 14%），這反映「商界－學校」類別的活動尚有很大發展空間。

對未來研究的啟示

截至本文竣稿為止，「起動計劃」踏入第四年，隨着計劃雙方合作更顯協調、暢順，建議日後類似的升學就業活動可作高中學生校外體驗或實習的參考。尤其此「商界－學校」計劃透過大學支援，能更有效調動商界人員專才，並促使學校更妥善運用商界資源，這種種協作方式均有助弱勢學生將職場體驗轉化為更具體的學習經驗。其中商界專才為何及如何分享他們的生涯歷程，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的支援隊伍如何轉化及強化弱勢學生的學習經驗，均值得未來透過質化研究或追蹤研究進一步探討。

最後，本研究發現社經地位處於弱勢的家庭在協助子女作升學就業決定和部署上出現一定限制，因此學生從學校及商界的學習活動可以補足升學就業資訊和體驗。然而，本研究未有探討父母在溝通或協商過程中與子女的互動如何影響學生對升學就業規劃的看法和部署。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可進一步探討父母對子女的期望、父母參與子女的教育等家庭變項，是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升學就業規劃。另外，本研究暫未有從學校的情境脈絡層面，分析學校因素如何影響弱勢學生升學和就業的具體技能。我們注意到這方面的重要性，建議未來的研究可考慮將學校在學習氣氛、學校社經地位平均值等變項納入多元迴歸分析，以進一步探討不同學校情境因素對弱勢學生的升學就業技能的影響。

鳴謝

本文作者特此分別感謝香港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 GRF）資助「香港青少年追蹤研究」（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Transition from Secondary School, HKLSA）（編號：444412），以及「PISA 為本學校改進計劃」研究（PISA-based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 PSIP）的支持。此外，還要感謝 HKLSA 研究團隊及優質學校改進計劃（Quality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 QSIP）成員對本文初稿提出的寶貴意見。本文內容只反映作者意見，並不代表資助機構立場。

註釋

1. Gardiner（2006）對「生涯」（career）一詞的意涵進行了相當詳細的整理：這一詞語自 19 世紀開始使用，從早期相當於職業（occupation），到後來 20 世紀 60 年代，其意義開始擴闊，概念更為豐富，泛指人對生活形態的實踐，包括任何場景（學校、職業場所、家庭、社會）、角色（僱員、家庭成員、公民）中謀利或非謀利性質的工作。華文對這詞多以「生涯」及「事業」對譯，本文避免與「職業」混淆，故通篇選取「生涯」一詞。
2. 「組別」指「收生組別」。根據香港中學目前中一新生派位機制，按照全港升讀中一學童的考試成績由高至低排列。「第三組別」學生為成績最低的三分之一，在學習動機及行為紀律方面需要較多關注。
3.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類別，這是指介乎 12–18 歲年齡層的全職學生（政府統計處，2012）。
4. 「香港青少年追蹤研究」（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Transition from Secondary School）是以香港 PISA 2012 計劃延伸的一項青少年追蹤研究，是香港首項有系統追蹤青少年升學與就業歷程的縱向研究，以不同收生組別（高、中、低）學校的受訪學生為研究對象。本研究亦採用了該追蹤研究部分問卷內容，其中抽取有關「了解升學就業資訊的一般途徑」的題項，故此可以利用該數據在此作對比分析。
5. 學生參與各項「商界－學校」活動的次數受限於「起動計劃」所能運用的資源而提供的參與機會，以及學校在行政上如何規劃這些工作（例如選取合適學生及時間參與等）。除「學長或導師計劃」外，基本上其餘活動的參與機會相若。

參考文獻

平等機會委員會（1999）。《「分析課本與教材內定型觀念」研究》。擷取自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Research/content.aspx?ItemID=9927>

- 平等機會委員會（2000）。《「學生對性別定型及家庭崗位的態度」基線研究報告》。
擷取自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Research/content.aspx?ItemID=6650>
- 政府統計處（2012）。《2011 人口普查》。擷取自網上互動數據發布服務：
<http://itable.censtatd.gov.hk/UI/Report/Report.aspx?lang=zh-HK>
- 政府統計處（2014）。《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擷取自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303032014AN14B0100.pdf>
- 〈研究：修應用學習缺升學渠道〉（2014，7月25日）。《星島日報》。擷取自 <http://std.stheadline.com/yesterday/edu/0725go03.html>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3）。《2012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擷取自 http://www.povertyrelief.gov.hk/pdf/2012_Poverty_Situation_Chi.pdf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4）。《二零一四年施政報告》。擷取自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4/chi/pdf/PA2014.pdf>
- 婦女事務委員會（2013）。《香港女性統計數字 2013》。擷取自 http://www.women.gov.hk/download/research/HK_Women2013_c.pdf
- 曾榮光（首席研究員）（2004）。《推行〈中學教學語言指引〉之評鑑研究：1999 年至 2002 年》。香港，中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 黃顯華、韓孝述、李文浩（2012，9月）。〈「大學－商界－學校」協作在前期發展階段的特色：以職場參訪活動為例〉。論文發表於第六屆「學校改進與夥伴協作」兩岸四地研討會，台北，台灣。
- 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9）。《應用學習課程及評估指引（高中課程）》。
擷取自 http://334.edb.hkedcity.net/doc/chi/Applied_Learning_Curriculum_&_Assessment_Guide_C.pdf
- 〈應用學習報讀人次跌穿一萬〉（2013，5月20日）。《星島日報》。擷取自 <http://m.singtao.com/showContent.php?main=paper&sub=4&title=4&page=0&StrContentId=20130520g01>
- 藍郁平、何瑞珠（2013）。〈從 PISA 剖析家庭社會資本對學生基礎能力的影響〉。
《教育學報》，第 41 卷第 1-2 期，頁 65-83。
- Bandura, A.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Bandura, A., Barbaranelli, C., Caprara, G. V., & Pastorelli, C. (2001). Self-efficacy beliefs as shapers of children's aspirations and career trajectories. *Child Development*, 72(1), 187-206. doi: 10.1111/1467-8624.00273
- Bem, S. L. (1981). Gender schema theory: A cognitive account of sex typ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88(4), 354-364. doi: 10.1037/0033-295X.88.4.354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241-258). New York, NY: Greenwood.
- Bynner, J. (2000). Social change and the sequencing of developmental transitions. In L. J. Crockett & R. K. Silbereisen (Eds.), *Negotiating adolescence in times of social change* (pp. 89-103).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Supplement), S95–S120.
- 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ay, A. L., & Chamberlain, T. C. (2005). Committing to your work, spouse, and children: Implications for work-family conflict.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68(1), 116–130. doi: 10.1016/j.jvb.2005.01.001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2010). *Unfolding opportunities: A baseline study of school-business relationships in Australia — Final report*. Retrieved from http://docs.education.gov.au/system/files/doc/other/partnerships_for_schools_businesses_and_communities_appendix_1_and_2_final_study_report.pdf
- DiMaggio, P. (1982).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success: The impact of status culture participation on the grades of U.S. high school stud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2), 189–201.
- Farmer, H. S. (1985). Model of career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for women and men.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32(3), 363–390. doi: 10.1037/0022-0167.32.3.363
- Farmer, H. S. (1997). Women's motivation related to mastery, career salience, and career aspiration: A multivariate model focusing on the effects of sex role socialization.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 5(4), 355–381. doi: 10.1177/106907279700500401
- Friedman, S. R., & Weissbrod, C. S. (2005). Work and family commitment and decision-making status among emerging adults. *Sex Roles*, 53(5/6), 317–325. doi: 10.1007/s11199-005-6755-2
- Gardiner, B. (2006). *Young people's perception of career success in Aotearoa/New Zealand: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Research Report No. 3/2006). Retrieved from http://lmd.massey.ac.nz/publications/Research%20reports/career_success.pdf
- Gilbert, L. A. (1994). Reclaiming and returning gender to context: Example from studies of heterosexual dual-earner familie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8(4), 539–558. doi: 10.1111/j.1471-6402.1994.tb01047.x
- Gottfredson, L. S. (1996). Gottfredson's theory of circumscription and compromise. In D. Brown & L. Brooks (Eds.), *Career choice and development: Applying contemporary theories to practice* (3rd ed., pp. 179–232).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Gottfredson, L. S. (2002). Gottfredson's theory of circumscription, compromise, and self-creation. In D. Brown & Associates (Eds.), *Career choice and development* (4th ed., pp. 85–148).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Gottfredson, L. S. (2005). Applying Gottfredson's theory of circumscription and compromise in career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In S. D. Brown & R. W. Lent (Ed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ounseling: Putting theory and research to work* (pp. 71–100).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 Heinz, W. R. (2003). Youth transitions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In A. Furlong (Ed.), *Handbook of youth and young adulthood: New perspectives and agendas* (pp. 3–13). Oxford, England: Routledge.

- Ho, Y. F. (2008). Reflections on school care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Responses to Norman C. Gysbers, Darryl Takizo Yagi, and Sang Min Lee & Eunjoo Yang. *Asian Journal of Counselling, 15*(2), 183–205.
- Holland, J. L. (1985). *Making vocational choices: A theory of vocational personalities and work environments*. New York, NY: Prentice Hall.
- Holland, J. L. (1997). *Making vocational choices: A theory of vocational personalities and work environments* (3rd ed.). Odessa, FL: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
- Jodl, K. M., Michael, A., Malanchuk, O., Eccles, J. S., & Sameroff, A. (2001). Parents' roles in shaping early adolescents' occupational aspirations. *Child Development, 72*(4), 1247–1265. doi: 10.1111/1467-8624.00345
- Kim, D. H., & Schneider, B. (2005). Social capital in action: Alignment of parental support in adolescents' transition to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Social Forces, 84*(2), 1181–1206. doi: 10.1353/sof.2006.0012
- Lareau, A. (1987).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family-school relationship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capit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0*(2), 73–85.
- Lareau, A. (2000). *Home advantage: Social class and parental intervention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2nd ed.).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Lareau, A., & Horvat, E. M. (1999). Moments of social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Race, class,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family-school relationship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2*(1), 37–53.
- Lent, R. W. (2005). A social cognitive view of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ounseling. In S. D. Brown & R. W. Lent (Ed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ounseling: Putting theory and research to work* (pp. 101–127).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 Lent, R. W., Brown, S. D., & Hackett, G. (2002).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In D. Brown & Associates (Eds.), *Career choice and development* (4th ed., pp. 255–311).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Leung, S. A. (1999). *Quality education: A career development and self-concept approach* (School Education Reform Series No. 3). Hong Kong, China: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 Leung, S. A. (2002). Career counseling in Hong Kong: Meeting the social challenges. *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50*(3), 237–244. doi: 10.1002/j.2161-0045.2002.tb00899.x
- Leung, S. A. (2008). The big five career theories. In J. A. Athanasou & R. V. Esbroeck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areer guidance* (pp. 115–132).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4). *Career guidance: A handbook for policy makers*. Retrieved from <http://www.oecd.org/education/innovation-education/34060761.pdf>
- Payne, J. (2001). *Patterns of participation in full-time education after 16: An analysis of the England and Wales Youth Cohort Study* (Research Report RR307). Retrieved from <http://dera.ioe.ac.uk/4577/1/RR307.pdf>

- Perrone, K. M., Webb, L. K., & Blalock, R. H. (2005). The effects of role congruence and role conflict on work, marital, and life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Career Development, 31*(4), 225–238. doi: 10.1007/s10871-005-4737-9
- Sandefur, G. D., Meier, A. M., & Campbell, M. E. (2006). Family resource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attendanc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5*(2), 525–553. doi: 10.1016/j.ssresearch.2004.11.003
- Savickas, M. L. (2002). Career construction: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vocational behavior. In D. Brown & Associates (Eds.), *Career choice and development* (4th ed., pp. 149–205).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Sewell, W. H., Haller, A. O., & Portes, A. (1969). The educational and early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proc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4*(1), 82–92.
- Super, D. W. (1969). Vocat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Persons, positions, and processes.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1*(1), 2–9. doi: 10.1177/001100006900100101
- Super, D. W. (1980). A life-span, life-space approach to career development.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6*(3), 282–298.

“Business–School” Partnership: Equipping Underprivileged Secondary Students in Hong Kong With Skills to Prepare for Furthe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Esther Sui-Chu HO, Chrysa Pui-Chi KEUNG,
Walter Chun-Wai YEUNG, & Antony Man-Ho LI

Abstract

In most cases, adolescents seek help from their parents and peers when facing the post-secondary decision: continuing education or going for immediate employment. However to those from underprivileged families lacking 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s, the exposure and information accessible are limited in preparing them for future development. In such case, participation in activities inside and outside of school is important to them. In particular, activities initiated in the model of “business–school” partnership are seen as good sources of practical information and relevant experiences. The present study collected survey data from a large-scale “business–school” partnership project in Hong Kong, involving about 3,800 secondary students in 2013.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ing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ose activities under the project and their skills to prepare for furthe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personal and family backgrounds (i.e., gender, place of birth, family structure, socioeconomic statu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participation in such activities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developing underprivileged students’ skills to prepare for furthe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Keywords: “business–school” partnership; underprivileged students; skills to prepare for furthe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career development